

# 甘博亚《冒牌者》中的中国书写 与南南东方主义\*

覃 琳

**内容提要** 哥伦比亚“麦孔多一代”作家圣地亚哥·甘博亚的旅行小说《冒牌者》通过对三种东方主义范式的突破与超越，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质的拉美南南东方主义叙事。这种南南东方主义的核心本质并不是直接逆转和颠倒南—北的权力关系，而是通过加强南南主体之间的团结来实现对北方的批判。

**关键词** 《冒牌者》 中国书写 南南东方主义 旅行叙事 麦孔多一代

当马尔克斯与魔幻现实主义如小镇马孔多一般，被一阵看不见的飓风吹散于天际，哥伦比亚文学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圣地亚哥·甘博亚似是那破局之人。1965年，甘博亚出生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这片曾孕育过马尔克斯的文学沃土以别样的养分滋养着甘博亚，最终使他与马里奥·门多萨、豪尔赫·弗兰科并肩，成为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也被称为“麦孔多一代”<sup>①</sup>，引领当代哥伦比亚文学重回国际视野。甘博亚身上萦绕着一股开创“拉美新文学”的使命感，如同他笔下走遍世界的主人公一样，甘博亚“飞越亚马孙，横跨大西洋，掠过非洲，抵达波斯湾，接着是小亚细亚、印度斯坦，最后是马来半岛”<sup>②</sup>。墨西哥学者拉蒙·阿尔瓦拉多·鲁伊斯认为这段引文最能概括甘博亚所创造的“拉美新文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拉美文学与东方的南南跨文化研究”（19YJC752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See Mónica Montes Betancourt, “Mario Mendoza y Santiago Gamboa en el panorama de la generación McOndo: obsesiones e inconsistencias”, in Bogdan Piotrowski, ed., *Miradas axiológicas a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Chía: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La Sabana, 2012, p. 333.

② Santiago Gamboa, *Plegarias nocturnas*, México D. F.: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2, p. 135.

的特征：“一种持续的流动感，以及作家将故事置于不同背景中的诉求。”<sup>①</sup>

在各种“故事背景”中，中国是甘博亚笔下最重要的一站。自1998年第一次造访中国后，他相继创作了《北京十月》（2001）、《冒牌者》（2002）和《北京饭店》（2008）等北京题材小说。这一系列作品集中体现了当代拉美作家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并呈现出“另类东方主义”的倾向。另类东方主义的诞生得益于近年来拉美人士渐觉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刻板而不实，于是开始省思拉美该如何言说东方。由此，拉美研究者积极投身重写东方主义的思潮，构建诸多颠覆性理念与概念，拉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卡尔沃将此思潮归纳为“另类东方主义”。<sup>②</sup>“另类东方主义”也常常与“南南东方主义”混用，泛指以非西方中心视角观看东方的范式，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自十九世纪末就在拉美出现<sup>③</sup>；而“南南东方主义”则是另类东方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阶段性升级与具体形态。

南南东方主义以南北轴心建立起框架，聚焦全球南方之间的交流互动，超越了传统的东西关系。<sup>④</sup>虽然“全球南方”覆盖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但实际上它超越了地理和地缘因素，“指代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负面影响的区域与群体”，因而“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也存在着‘南方’，地理意义上的南方也存在着‘北方’”。<sup>⑤</sup>也就是说，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

<sup>①</sup> Ramón Alvarado Ruiz, “Santiago Gamboa y Jorge Volpi, una mirada compartida de una narrativa global y local”, in *Estudios de literatura Colombiana*, 43 (2018), p. 96.

<sup>②</sup> 拉美研究者对另类东方主义的思索集中体现于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卡尔沃主编的三部著作：《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另类东方主义》（*Alternative Orientalism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2007）、《边缘的互读：透过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了解“东方”》（*One World Periphery Reads the Other: Knowing the “Oriental”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Iberian Peninsula*, 2010）以及《边缘的跨现代性：卢索-西语世界与“东方”之间的南南跨文化对话》（*Peripheral Transmodernities: South-to-South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nd “the Orient”*, 2012）。

<sup>③</sup>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拉美这片充满幻想与理性思辨的土地上产生了若干东方主义的替代方案。比如，朱莉娅·库什吉安提出“西语美洲东方主义”（Hispanic Orientalism），鉴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对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不适用性，该理念倡导以理性途径与东方开展知识交流，构建开放平等的拉丁美洲式东方主义（see Julia Alexis Kushigian, *Orientalism in the Hispan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Dialogue with Borges, Paz, and Sardu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1）；加布丽埃拉·豪雷吉的“去东方主义”（De-Orientalism）和尚洛米·穆阿莱姆的辩证东方主义（Dialectical Orientalism）等亦各具特色（see Gabriela Jauregui, “Apuntes on Orientalism in/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Darío, Tablada, Borges, Paz and Sarduy”, i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08], pp. 59–72；Shlomy Mualem, “Imaginative Geography: Dialectical Orientalism in Borges”, in *Transmodernity: Journal of Peripheral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Luso-Hispanic World*, 1 [2016], pp. 131–151）。

<sup>④</sup> See Ignacio López-Calvo, “Review of *Imaging the Chinese in Cub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Alternative Orientalism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in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 (2009), p. 216.

<sup>⑤</sup> See Anne Garland Mahler,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32.

念，其判断依据在于某一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是否在世界格局中处于边缘，甚至是否“系统地遭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造成的不公正、统治和压迫”<sup>①</sup>。因而，南南东方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边缘对另一个边缘的言说”，它“彰显了亚洲-拉丁美洲相互联结的愿望”，既是“探索南南交流的路径，也是对西方霸权的有力挑战”。<sup>②</sup>

在美国经济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和拉美同处半边缘或边缘位置<sup>③</sup>，因而甘博亚的旅行小说《冒牌者》正是南南交流的生动范例。小说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拥有不同背景，却不约而同来到北京：苏亚雷斯·萨尔塞多为哥伦比亚驻法记者，受命来北京展开基督教徒现状调查；纳尔逊·周辰·奥塔洛拉是居住在美国的秘鲁籍华裔文学教授，试图寻找自己的中国之根，并想以此经历写一部小说，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第三位主人公克劳斯·吉斯伯特是土生土长的德国汉学家，“就像他敬爱的儒勒·凡尔纳一样，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土地”<sup>④</sup>，但是渴望与中国产生真实的链接，以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概言之，这三位主人公在临近千禧年之际来到中国“都是由梦想驱动”<sup>⑤</sup>，但同时也分别对应着“与东方交流的不同模式”<sup>⑥</sup>。

小说中，原本互不相识的三个人被一份百年前遗失的手稿吸引而相聚，将旅行变成了一场寻找手稿的探险。这份重现江湖的手稿是清朝诗人王勉（Wang Mian）<sup>⑦</sup>的诗集。1899年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反抗列强时，正是这份手稿将义和团凝聚在一起。一百年后，义和团后人渴望东山再起，于是他们的首领找到周辰，告知其曾祖父乃当年起义的领袖，唯有周辰寻回手稿、重整队伍，方可重振义和团声威。法国基督教教会亦找到萨尔塞多，称唯有寻得手稿，方能遏

①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and the Future”, in *European South: A Trans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Humanities*, 1 (2016), p. 19.

② See Chisu Teresa Ko, “Orientalism and De-Ori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Reading César Aira”, in *Transmodernity*, Special Issue (2018), p. 151.

③ 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④ Santiago Gamboa, *Los impostores*, Barcelona: Seix-Barral, 2002, p. 4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Impostore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 Mónica Montes Betancourt, “Resena de *Los Impostores* de Santiago Gamboa”, in *Pensamiento y cultura*, 5 (2002), p. 181.

⑥ Héctor Hoyos, “Orientalismo, globalización e imaginarios transpacíficos en la novela latinoamericana actual”, in *Cuadernos de literatura*, 34 (2013), p. 90.

⑦ 在小说中，王勉著有小说《改名记》（*Historia de los nombres cambiados*）、诗集《空气的悠远明净》（*Lejanas transparencias del aire*）等作品。王勉其人其作均为甘博亚的文学虚构。

制当代新义和团的崛起，避免百年前外国牧师惨遭杀戮的悲剧再度上演；吉斯伯特则通过钻研文献洞察到手稿的学术价值，一心期望顺利拿到它，从而在汉学界成为“利玛窦”般的大人物。“手稿”是整个中国的隐喻，探寻手稿的过程实则就是探寻真实中国的历程。于是，小说呈现了旅行叙事与中国书写交织的双管道结构。从古老手稿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到人物在传统街巷、茶馆等典型中国式场景中的互动，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展现了拉美美人重新审视中国的独特视角与方式，尤其是对中国人、中国形象、中拉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再叙事。

萨义德曾提出旅行文学和东方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事实性陈述和虚构性描写的结合，意味着殖民主义旅行写作是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最好骨架。”<sup>①</sup>从表面上看，《冒牌者》的双管道结构似乎吻合了这种同构性，然而拉美与西方的立场并不相同，所以拉美旅行叙事与另类东方主义的关系不能与上述同构关系画上等号。拉美旅行叙事跨越了国别与文化边界，成为南南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另类东方主义则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使得南南对话更具有有效性和反思性。本文将围绕这一关系，通过挖掘以甘博亚等作家为代表的麦孔多一代在小说叙事形式上的创作特质，剖析当代拉美文学中南南东方主义的多元呈现与深刻内涵。

### 一、谁是“旅行骗子”：

#### 《冒牌者》对欧洲旅行叙事与西班牙式东方主义的改写

在来华途中，三位主人公将欧洲早期各类旅行作品塞进各自的旅行箱中，作为自己的旅行读物。汉学家吉斯伯特带了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北京日记》以及比利时神父多米尼克·阿里斯蒂德的一本回忆录<sup>②</sup>，两部作品都是欧洲人在义和团事件期间的见闻纪实。洛蒂笔下的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苦难，沿途尽是“死亡、破坏和焦土”，“河水被鲜血染黑，不时看到浮尸”；而阿里斯蒂德毫不掩饰地诋毁中国人，指责他们是“懒惰、放荡且沉迷赌博的民族，甚至会为了继续掷骰子而赌上自己的辫子”，并将他们贬斥为“忘恩负义者”——以“野蛮的习俗、炮火和袭击”回报西方的教化之功（see *Impostores*: 44, 189）。记者萨尔塞多从图书馆借来法国作家亨利·米修的《野蛮人在亚洲》。米修嘲讽中

<sup>①</sup> 转引自田俊武《旅行写作》，载《外国文学》2021年第4期，第103页。

<sup>②</sup> 小说没有给出具体的书名，据查现实中并无此人，应为甘博亚杜撰。

国人长着一张“果冻脸”，五官仿佛“果冻裂开后，跑出一只笨拙的老鼠”（see *Impostores*: 25）。至于作家周辰，他的行李箱里装了几本法国人写的作品，包括旅行家维克多·塞加伦的《美味小说》等。甘博亚没有详细描写周辰阅读这些书籍的情景，只是戏谑地谈及他携带《美味小说》的原因：“我记得其中一些故事是在北京的妓院里发生的，这可能对我有用。”（*Impostores*: 83）

三位主人公选取的这些欧洲旅行文本集中出版于二十世纪初这一欧洲对中国充满负面认知的时期。早在这以前，西方作家的负面中国书写已经成为拉美认知中国的主要来源。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的东方主义范式随殖民活动跨洋迁移至拉美，成为西班牙殖民者驯化美洲原住民的工具。这一时期拉美对中国的看法完全追随西方：“十九世纪的拉美作家借助东方主义，以‘外来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构建异国情调空间。”<sup>①</sup> 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丘蒂娜将这一阶段称为“他者化机制”下的“西班牙式东方主义”。<sup>②</sup> 匈牙利学者西尔维娅·纳吉-泽克米指出，这种东方主义建立在拉美和中国之间的距离之上，这一距离既能“阻止观察者实现其对他者的欲望”，又能“突出被观察对象的负面特质，同时将其身上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塑造成一种来自‘不可理解、无法渗透的文化’中的怪异元素”。<sup>③</sup> 在此范式下，接受欧洲教育的拉美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切断了与印第安祖先之间的文化血缘，反而沿着法国的那条“文学子午线”<sup>④</sup> 进行思考。但这种所谓的“思考”不过是对中心的挪用、复制和翻录，将拉美文明视为“欧洲文明尽善尽美、正确无误的抄本”<sup>⑤</sup>。从西方输入的思想越多，思考就越来越变成“不思考”。<sup>⑥</sup>

① Silvia Nagy-Zekmi, “Buscando el Este en el Oeste: prácticas orientalistas en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in Silvia Nagy-Zekmi, ed., *Moros en la costa: orientalismo en Latinoamérica*, Iberoamericana: Vervuert, 2008, p. 18.

② See Svetlana V. Tyutina, *Hispanic Orientalism: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a Cultural Paradigm, from Medieval Spain to Modern Latin America*, PhD Dissertation,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14, p. 31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Hispanic”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See Silvia Nagy-Zekmi, “Buscando el Este en el Oeste: prácticas orientalistas en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p. 17.

④ 大英帝国在其辉煌时代，以自身位置为参考点，构建了一条世界时区轴线——格林尼治子午线，以此确定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根据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理论，文学上的子午线位于巴黎，她认为巴黎拥有最古老和强大的文学资本，法国作家手握其他边缘作家加冕的权力（详见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7-101页）。

⑤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71页。转引自韩琦《论拉丁美洲现代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33页。

⑥ See Eduardo Devés, “Hacia una teoría de la circulación, con énfasis en la circulación de las ideas”, in Gesine Müller, Jorge J. Locane and Benjamin Loy, eds., *Re-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Writing, Book Markets, and Epistemologie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South*,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8, pp. 266-267.

在这两个世纪内，中国文化能够在拉丁美洲传播，并非依靠“外交政策的推动”，也非借助“系统的课程设置”，而主要得益于关键文化代理人的“行李箱”。<sup>①</sup> 这些文化代理人通过个人视角，将其价值观传递给拉美读者，从而实现了中国文学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因此，西班牙学者卡莱斯·普拉多 - 丰特斯将拉美读者所接触的中国归纳为“二手的中国”。<sup>②</sup> 拉美知识分子全盘接受了欧洲的“行李箱”，对中国的看法深陷于被动接受的认知困境中。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机制都深深影响了“拉美对次要文化以及自我的认知”（*Hispanic*: 318）。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拉美的后帝国时期。独立后的拉美并未即刻迎来文化的繁荣，反而陷入文化身份的迷茫，尤其是西方将拉美与东方并置，“将美洲原住民等同于‘东方人’，这种关联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书写拉美的方式”<sup>③</sup>，极大地激起了拉美的身份焦虑。“对民族身份的追求，几乎导致拉美对他者性问题的痴迷。”（*Hispanic*: 282）在此语境中，拉美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以此思考自己的民族身份：如果欧洲对中国的负面书写是一套霸权话语，那么欧洲对拉美的书写是否也是如此？拉美能否在对欧洲亦步亦趋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与先锋派运动的兴起，为这场反思注入了全新维度，开启了“拉美文学系统性地与东方接触的关键阶段”<sup>④</sup>，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现代东方主义”<sup>⑤</sup>。

在这一时期，上至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下至蕴含东方气韵的器具物什，大量东方元素被引入拉美现代主义作家的诗作中。这些元素并非零散的异国情调点缀，而是被整合进对“艺术、文学、宗教与历史”的系统性论述中，拉美文化的自我定位随之与“东方器物审美价值”产生关联。<sup>⑥</sup> 拉美作家不再被动接受欧洲

① See Rosario Hubert, *Disoriented Disciplines: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the Shape of World Literatu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15.

② See Carles Prado-Fontes, *Secondhand China: Spain, the East,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9.

③ Silvia Nagy-Zekmi, “Buscando el Este en el Oeste: prácticas orientalistas en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p. 14.

④ Koichi Hagimoto, “From Hegel to Paz: Re-reading Orientalism i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Hipertexto*, 17 (2013), p. 17.

⑤ 探讨拉美现代东方主义的著作有朱莉娅·亚历克西斯·库希吉安的《西班牙文学传统中的东方主义：与博尔赫斯、帕斯及萨杜伊对话》（*Orientalism in the Hispan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Dialogue with Borges, Paz, and Sarduy*, 1991）、阿拉塞利·蒂纳赫罗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o en el modernismo hispanoamericano*, 2003）、西尔维娅·纳吉 - 泽克米编撰的《海岸的摩尔人：拉丁美洲的东方主义》（*Moros en la costa: Orientalismo en Latinoamérica*, 2008）以及斯维特兰娜·丘蒂娜的《西班牙美洲东方主义：一种文化范式的文学发展（从中世纪西班牙到现代拉丁美洲）》（*Hispanic Orientalism: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a Cultural Paradigm, from Medieval Spain to Modern Latin America*, 2014）等。

⑥ See Koichi Hagimoto, “From Hegel to Paz: Re-reading Orientalism i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pp. 16-17.

对东方事物的猎奇式解读，而是主动重构其内涵，为自身寻找非西方主导的价值坐标。库什吉安将帕斯等拉美现代主义诗人笔下的东西方关系归纳为“两岸”，拉美被视为“一岸”，东方则为“另一岸”，二者的相互映照象征着“对立面的瞬间融合，具有重要意义”。<sup>①</sup> 中国成了拉美对抗欧洲霸权的同盟镜像，这种“以东方为镜”的文化认知策略，标志着现代主义阶段拉美对西方负面中国书写的认知从“被动接受”正式转向“主动消解”，并努力形成“非西方他者之间的跨太平洋联结”。<sup>②</sup> 从这个阶段开始，拉美人在认知思维和审美能力上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虽然西方的殖民历史给拉美遗留下许多文明因子，拉美人对世界的思考方式仍然根植于西方，但近百年来，拉美作家也在不断质疑和挑战着西方框架<sup>③</sup>，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表现正是这种认知悖论的体现：既深受东方主义的熏染，又渴望对这一思想加以改造，以跳脱这种偏色镜带来的视角辖制和思想控制。

因此，《冒牌者》中的拉美知识分子面对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辱华小说时已经不再盲目地全盘接纳，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三位主人公秉持的态度中：吉斯伯特带着语言学家的审慎，对阿里斯蒂德的偏见“大失所望”，认为这是“一系列的辱骂和侮辱”，要么就是“胡言乱语”（see *Impostores*: 190）。同样，萨尔塞多读到将中国人的样貌描写为“老鼠”时不禁拍案而起：“这太傲慢、太侮辱人了，我无法忍受！”为了表达愤怒，萨尔塞多也开始描述他眼中的法国人：“据说法国人发明香水是因为他们不洗澡，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头发金黄、眼睛突出，皮肤皱巴巴的。”他拿出了西方主义的法宝，即一种炮制西方的反向操作，照葫芦画瓢展开反击，但他随即意识到这并非一种公允的群像刻画方式（see *Impostores*: 25-26）。甘博亚在他的人物身上注入了“去东方主义”的意识，这也是近年来拉美东方叙事的发展趋势：“最近一些以亚洲为主题的拉美文学作品对东方主义有着高度的自我意识，甚至展开了对东方主义作品的模仿。”<sup>④</sup> 他们模仿的目的，不仅是质疑不实的东方，更是为了积极建构真实的东方。

为了寻找真正的东方，三位主人公不断思考旅行叙事中的核心议题——真实性。回首过往，不同时代的作者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大相径庭：“浪漫主义的旅行

① See Julia Alexis Kushigian, *Orientalism in the Hispan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Dialogue with Borges, Paz, and Sarduy*, p. 44.

② See Koichi Hagimoto, “From Hegel to Paz: Re-reading Orientalism i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p. 16.

③ See Debra Lee-Distefano, “Theory, Orientalism and A Perspective on Their Place in the Study of Asians in the Americas”,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Peripheral Transmodernities: South-to-South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nd “the Orient”*,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2, p. 15.

④ Amanda Holmes, “China in Argentine Exotismo: Contemporary Inventions of the Orient”, in *Bulletin of Spanish Studies*, 1 (2008), pp. 71-72.

作家坚信，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感波动乃至情感破裂的事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而在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十八世纪旅行者眼中，唯有能够被精确衡量和清晰认识的事物，才配得上被称作真实。”<sup>①</sup> 洛蒂的《北京日记》显然不属于这两种旅行叙事。洛蒂认为，谁具有观看的权威，谁就具有真实性，他借助一种“超脱于主体真实与客体真实之外的权威感”<sup>②</sup> 去营造他所认定的真实，这一权威感象征了“北半球（或西方）的霸权以及它对旅行特权的控制”<sup>③</sup>。意识到这一点后，吉斯伯特决定亲自使用这个“旅行特权”前往中国，在异乡找到“一种更大的现实输入”（*Impostores*: 49），以便能看见真正的中国。吉斯伯特的这个决定，代表拉美东方主义进入了当代的南南东方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拉美作家在观看中国时，极力避免受第一世界或霸权社会团体的干扰，尽量用“裸眼”来观照自己的南方伙伴。<sup>④</sup>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西班牙东方主义话语“从本质上说带有某种诋毁性”<sup>⑤</sup>，那么南南东方主义观看中国的目的就是“看见真相”，而非出于帝国的权力欲望，也非借用他者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性，更不试图建立一套不平等关系，如霍约斯所说：“南南东方主义包含着帝国主义的幽灵，却没有复制其文化优越性的意识形态。”<sup>⑥</sup> 再与第二阶段的现代东方主义相对照，南南东方主义可以被视为对前者核心内涵的延伸。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初的作家试图消解欧洲对东方的观看范式，例如，博尔赫斯的作品往往被视为“现代东方主义的象征”，他擅长使用各种文学实验，暴露传统东方主义的认知谬误。丘蒂娜将这种建构东方的方式称为“分岔式东方主义”：不将“东方”与“拉美”视为对立，而是视为“互相映照的分岔”，通过“迷宫”等东方意象重构拉美历史的多义性，证明拉美文化与东方一样，具有独立于欧洲的认知价值（see *Hispanic*: 282–283）。南南东方主义因循这一思路，将中国视作打破单一认知的“分岔性”存在，它不再是静态的客体，而是一个动态的对话伙伴。

在《冒牌者》中，这种“分岔性”的对话体现在一场别出心裁的文本叙事游

① Rosario Hubert, “Rewriting Travel Literature: A Cosmopolitan Critique of Exotic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Fi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Peripheral Transmodernities: South-to-South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nd “the Orient”*, p. 19.

② Ralph Pordzik, *The Wonders of Travel: Fiction, Tour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Nostalgic*, Heidelberg: Winter, 2005, p. 17.

③ Reminder Kaur and John Hutnyk, *Travel Worlds: Journe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1999, p. 1.

④ See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Peripheral Transmodernities: South-to-South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nd “the Orient”*, p. 3.

⑤ 王宁《爱德华·赛义德的遗产》，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154页。

⑥ Héctor Hoyos, “Orientalismo, globalización e imaginarios transpacificos en la novela latinoamericana actual”, p. 100.

戏中。在传统旅行叙事模式里，叙述者是权威的化身，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这部小说中，甘博亚用丰富的叙事维度，打破了“叙述者中心”的特权：小说安排三位主人公轮流承担叙述重任，在他们的叙述中，各人又分别采用独特的方式创作了属于自己的旅行文学——记者选择类似于新闻报道的纪事，语言学家借助录音机把见闻感悟记录下来，作家则以诗歌和讲稿来呈现旅途。这三个人物讲述的旅行文本与小说主体形成了双层叙述结构：三个旅行文本可以看作热奈特所说的“承文本”，即承接前文本的后文本。甘博亚将这些承文本与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所写的前文本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种“超文本关系”。<sup>①</sup>在承文本和前文本之间产生了必然的裂缝：例如，关于天气，吉斯伯特发现“北京的天气非常宜人，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与他读过的沙尘暴和雾霾天大相径庭”；关于中国人形象，当吉斯伯特第一次与出租车司机顺利地聊起“天气、交通、来自戈壁的沙尘暴”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友好和善，以及他们对交流的开放态度；关于义和团，一直以来起义者被西方视为嗜血成性、杀害牧师的野蛮人，但是一位中国书商告诉吉斯伯特，将义和团称为“拳击手”（Boxers）是“西方错误的称呼”，他们并非暴力的乌合之众，而是反对西方侵略的英勇之士（see *Impostores*: 234, 116, 137）。霍约斯认为，甘博亚不仅为拉美读者绘制了鲜为人知的东方版图，还以一种历史视角呈现前后文本的比照，彰显了拉美在建构南南东方主义时的“逆向思维”<sup>②</sup>，即切断西方，切断中心，立足南方的认知系统来言说南方，这使得“‘南方视角’成为拉丁美洲致力打造的新型叙事模式，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sup>③</sup>。

三个“承文本”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分歧之处。例如，三人对义和团起义的不同看法代表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不同态度。吉斯伯特凭借汉学知识，将其视为一场守卫家国的正义之战。他认为，义和团之所以暴力攻击西方传教士，是因为受到西方入侵和国破家亡的屈辱。中国“作为一个如此强大的帝国，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他们所有的战争都是防御性的，除了内战”，这更让他对德国

① 热奈特认为“前文本”是其后的文本，即“承文本”的主要含义来源；“超文本关系”是热奈特理论中的第四种文本超越类型，指的是在后面的文本B（承文本）中包含文本A（前文本）的关系。它不是以B评论A的方式嫁接起来，而是通过戏仿、挪移、拼贴、续写等方式进行构建，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这种关系（see Gérard Genette, *Palimpsestos: la literatura en segundo grado*, trans. Celia Fernández Prieto, Madrid: Taurus, 1989, pp. 7-9）。

② Héctor Hoyos, “Three Visions of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Novel”,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One World Periphery Reads the Other: Knowing the “Oriental”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Iberian Peninsula*,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0, pp. 157-158.

③ 马立明《加莱亚诺的“南方视角”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告别》，载《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8页。

曾经的侵略行为深感愧疚 (see *Impostores*: 234)。而萨尔塞多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较为片面, 当法国神父奥斯洛夫斯基认为义和团是“一个想要消灭基督教的邪教组织”, 在它面前“古罗马的迫害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时, 萨尔塞多无意探究历史真相, 只是关注当下手稿引发的权力博弈。为了逃离平庸的生活、体验一场“真正的冒险”, 萨尔塞多从神父手里接过了寻稿重任, 站在了义和团的对立面 (see *Impostores*: 153, 156)。周辰因祖父胡寿申曾是义和团运动的领袖, 而将这段历史视为家族身份的一部分。通过祖父的信件, 他得知义和团是为国而战的爱国团体, 代表了中国人“战斗到底的韧劲和血性” (*Impostores*: 339)。对周辰而言, 这段历史成为他重构家族荣誉和自我认同的核心素材, 帮助他成为新义和团的首领, 塑造了超越秘鲁身份之外的第二身份。上述三种声音时而相互驳斥, 时而相互呼应, 这一多样性叙事策略揭示了中国是一个多维的复合体。与此同时, 甘博亚更加注重个体在旅行中的真实体验, 展示了旅行叙事如何受制于个人背景与经历。换言之, “个人对异域会作出何种反应, 实际上折射了旅行者自身的文化倾向”<sup>①</sup>, 旅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互动的动态过程, 异乡的形象仅是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互相碰撞的结果。如此一来, 传统旅行叙事中那种霸权式的、真理式的中国书写便得以瓦解。

小说开篇设置了一个拥有上帝视角的人物: 藏匿了手稿的雷吉斯神父见证了整个探险历程, 他的见证性叙述与三位主人公的旅行叙事巧妙交织。哥伦比亚学者克莱门西亚·阿迪拉将《冒牌者》的这一复杂的叙事手法称为“深层嵌套”。<sup>②</sup>然而小说结束时会发现, 这个号称无所不知的人物其实一直与世隔绝, 甘博亚在开篇第一小节的标题里, 就给他起名叫“藏在阁楼里的人”, 与第二节描写萨尔塞多的标题“环游世界的人”形成对比。因为被关在阁楼里, 雷吉斯神父压根无从知晓外面发生的故事, 却留下一句话: “我无法说出我是如何能够叙述这一切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如此多的细节。我只想说一件简单的事: 我看到了。” (see *Impostores*: 11, 15, 349) 在这个叙事游戏中, 声称“看到”的雷吉斯, 和那些声称“看到”中国的欧洲旅行者们, 是否都是“旅行骗子”? 甘博亚不仅在此采用了“元旅行小说”的写法, 而且将小说命名为与“欺骗者”同义的“冒牌者”, 以促使读者重新审视欧洲传统旅行叙事的可靠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自

① 田俊武《旅行写作》, 第104页。

② See Clemencia Ardila y Grupo de Especialización en Hermenéutica Literaria EAFIT, “Los impostores de Santiago Gamboa: El juego de la escritura”, in *Estudios de Literatura Colombiana*, 13 (2003), p. 132.

恃拥有对异域世界阐释权的旅行作家们都是“旅行骗子”，只不过在“欺骗”的程度与性质上存在差异。诚如美国学者珀西·亚当斯所指出的：“有些旅行作家撒谎较少，或是仅撒些无关紧要的谎；而有些则谎话连篇，甚至刻意为之。”<sup>①</sup>有鉴于此，甘博亚没有让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成为居高临下的评判者，因为任何一种观看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承认文化认知的不可避免的偏见，恰恰是更深入对话的起点。小说最后，三个人都“拥有了一份手稿的副本，以此否定了任何等级差异”<sup>②</sup>。这种否认恰好区别于西班牙式东方主义的等级制话语，正如洛佩斯-卡尔沃所说：“拉美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可能会重现某些帝国主义幻想和心理结构，但通常不存在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理想化过程，也不存在在‘南南’知识和文化交流中展示本体论或种族优越性的尝试。”<sup>③</sup>

对于现代东方主义而言，作家们并不着力重构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致力于挖掘裂缝，呈现出“幻想空间大于现实空间”的形态。蒂莫西·韦斯认为博尔赫斯对东方的观念“源于教科书和书籍”而非“真实的生活经历”，终点是“构成一个幻想的空间，一种感觉，一系列哲学思想”。<sup>④</sup>但南南东方主义则截然相反，它不仅致力于在幻想空间中识别裂缝，更着力深入现实空间，探索这些裂缝背后潜藏的真实图景。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全球化时代跨国旅行及移民的便捷化进程密切相关。霍约斯认为，跨国旅行的增加得益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叠加。<sup>⑤</sup>到了二十世纪末，当拉美与中国的物理距离被打破，用双脚亲自丈量东方土地，进而讲述拉美人视角下的东方奇遇，便成为当代拉美东方书写的显著趋势。与此前仅凭对东方的想象和认知便进行东方书写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同<sup>⑥</sup>，在探索裂缝之中的潜藏之物的驱使下，南南东方主义作家让叙述者在当下所亲历的现实空间强力压倒幻想空间，并就此摆脱了“炉边旅行者”<sup>⑦</sup>的局限，

① Percy G. Adams, *Travelers and Travel Liars: 1660-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

② Maria Montt Strabucchi, *Imagining China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Manchester: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7, p. 209.

③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One World Periphery Reads the Other: Knowing the "Oriental"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Iberian Peninsula*, p. 5.

④ See Timothy Weiss, *Translating Orients: Between Ideology and Utop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 20.

⑤ See Héctor Hoyos, *Beyond Bolaño: The Global Latin American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6.

⑥ 关于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与东方主义的关联，学界观点尚存在分歧：有学者提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用精致话语营造异国情调”为特点，却不应归入萨义德所定义的东方主义范畴，因为其缺乏明确的帝国扩张动机；但另一些学者则反驳此观点，认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实则间接延续了殖民话语所建构的“欧洲优先”等级秩序（see Silvia Nagy-Zekmi, "Buscando el Este en el Oeste: prácticas orientalistas en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pp. 20-22）。

⑦ “炉边旅行者”（fireside travelers）是珀西·亚当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些从未到过非欧洲地区的西方作家，他们基于主观臆断展开想象式书写（see Percy G. Adams, *Travelers and Travel Liars: 1660-1800*, p. 82）。

转向了基于实地观察的文化对话，同时他们不再依赖二手资料或刻板印象来构建中国形象，而是主动走向市井街巷，以亲身经历消解此前被扭曲的认知，正如小说里的人物初到北京时感叹道：“我从远处研究和了解的东西，现在都具象化了。”（*Impostores*: 131）最终，他们从长久以来“被观察者”的身份转变为“新世纪对全球其他南方国家的敏锐且聪慧的观察者”<sup>①</sup>。他们的观察方式无疑是“反幻想”的：“至二十世纪末，自十九世纪初期盛行于拉美文化视野中的东方异国情调图景逐渐向着更多面立体、更贴合现实的表现形式悄然转变。”（*Hispanic*: 282）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拉美作家努力地“寻找亚洲与属于亚洲的真实，以及非东方主义书写的可能性”<sup>②</sup>。

这一代作家探索“真实”中国的目的在于抵制与消解所谓的“绝对真实”，因为他们深知追寻绝对真实是徒劳的。小说里三种不同的声音象征了文化交流的“非原真性”：不存在“真正的中国”或“纯粹的拉美视角”，文化意义始终在相遇与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南南东方主义体现了一种平行式的追求：不将某一观念视为“唯一真理”，而是通过跨文化交流构建“平行知识体系”（如对义和团的三种不同看法），强调东方形象与观察者之间的“协商性”而非“固定性”。<sup>③</sup>由此，南南东方主义突破了西班牙式东方主义被动接受的局限，也超越了现代东方主义主动消解的框架，将拉美东方主义推向了积极交流的全新阶段。

## 二、打破“玻璃球”：

### 《冒牌者》对魔幻现实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的改写

小说通过周辰这一角色，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巧妙的勾连。来到北京后，周辰开始创作一篇旅行小说，他在开篇写道：“我来北京，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胡寿申曾经在这里生活。”（*Impostores*: 102）此处与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的开篇惊人相似：“我来到科马拉，因为有人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人。”<sup>④</sup>通过对发表于1955年的拉美魔幻文学的奠基之作的互文式模仿，周辰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们致敬，同时也流露出无缘参与那场文学爆炸的遗憾。虽然周辰只是一个籍籍

① José Manuel Prieto, “*Treinta días en Moscú*: La escritura de un libro de viajes”, in *Caracol*, 3 (2013), p. 16.

② Chisu Teresa Ko, “Orientalism and De-Ori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Reading César Aira”, p. 153.

③ See José Manuel Prieto, “*Treinta días en Moscú*: La escritura de un libro de viajes”, p. 18.

④ Juan Rulfo, *Pedro Páramo*, Mé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6, p. 4.

无名的小作家，但他野心勃勃，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与略萨、科塔萨尔、马尔克斯、因凡特、富恩特斯等文学巨匠并列，用金色字母镶嵌在拉美的文学殿堂上”。他幻想着有一天，科塔萨尔邀请自己到他家中住几日，在那里，墨西哥诗人帕斯也翘首以盼，希望能借机认识这位炙手可热的文坛新星。在遐想中，他以“没空”为由，洋洋得意地拒绝了他们（see *Impostores*: 59–60）。

然而，怎样才能变幻想为现实呢？智利诗人奥斯卡·哈恩说过，马尔克斯们之所以获得世界的喝彩，是因为他们向世界奉献了彩色的玻璃球：

1492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时，受到了岛民的热烈欢迎和尊崇，他们以为看到了一位上天派来的使者。在以上帝和西班牙王室的名义完成占有仪式后，哥伦布开始讨好当地人，给他们分发彩色玻璃球，以博得他们欢心。近五百年后，那些美洲人的后代决定回报哥伦布的好意，向国际公众献上了新的彩色玻璃球，同样是为了博取欢心，这个玻璃球就是魔幻现实主义。<sup>①</sup>

马尔克斯一代将“玻璃球”视为最能体现拉美本质的象征物，并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进行了“自我东方化”的美学实践，这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动机与叙事策略。正如库什吉安所指出的，自我东方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策略”，它“通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主动地选择自我定位”<sup>②</sup>，因而与被动接受标签的传统东方主义并不相同。在文学形式上，爆炸一代通过“与主导文学模式相脱离”的方式，既摆脱了欧洲的“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或家乡文学”，又逃离了拉美传统的“社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印第安主义小说”<sup>③</sup>，以自主性语言和本土文化为根基，提供了一种非欧洲中心的文学范式；在政治形态上，适逢全球两极化的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连同作为拉美左翼核心的古巴）“纷纷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拉美作家群体拉拢至各自阵营”<sup>④</sup>，拉美作家被迫在美苏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定位。爆炸一代作家借助魔幻元素实现对政治压迫、社会危机的隐喻表达，既反

① Alberto Fuguet, Sergio Gómez, “Introduction”, in Alberto Fuguet and Sergio Gómez, eds., *McOndo*, Barcelona: Grijalbo Mondadori, 1996, p. 10.

② See Julia A. Kushigian, “The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and Self-Orientalism in a South-South Dialogue: Revisiting Hispanic Orientalism from Said to Sarduy”, in Susanne Klengel and Alexandra Ortiz Wallner, eds., *Sur / South,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Thinking Latin America / India*, Madrid: Vervuert Verlagsges, 2016, p. 99.

③ See Theo D’Haen, “Magic Real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 (2024), p. 18.

④ Ignacio Lopez-Calvo and Nicholas Birns, “Magical Realism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Cultural Interventions”, in Andrew Hammond,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ld War Liter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225.

驳了美国大力推崇的“非介入式”或“纯粹性”的美学主张，又努力抵抗古巴革命要求书写“革命文学”的号令。别样的“文学表达”是与“全新的政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sup>①</sup>，文学爆炸绝非单纯的文学革新，更是拉美文化身份的独立宣言。

然而，文学爆炸也加剧了拉美文学的标签化倾向。西方逐渐确立了对拉美文学的期待视野，他们满心希望拉美作家都能利用魔幻之光来增强作品的“东方性”，为西方提供一种“可供消遣的东方身份”。<sup>②</sup>比如当时还未成名的智利作家阿尔贝托·福格特曾将自己的手稿交到欧洲编辑的手中，编辑审阅后却冷言拒绝了他，理由是“作品缺乏魔幻现实的烙印，它可以出自任何一个第一世界的作家之手”<sup>③</sup>。同样，当甘博亚将他的黑色小说《失败乃方法的问题》（1997）推向意大利市场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阻力。<sup>④</sup>

马尔克斯给下一代的拉美作家投下了“巨大的木棉树阴影”，他们只能“忽略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耻地复制他”。<sup>⑤</sup>周辰选择了第二条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通过构建拉美的特殊性而获得了国际声誉，自己的中国背景无疑也是一种优势。于是，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试图寻找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元素：“在街角，一群老人在打麻将。有的穿着著名的毛时代的蓝外套，在纳尔逊[即周辰]看来，很像清洁工。他想：‘这应该是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尽管贫穷，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红色的灯笼从屋顶上垂下来。圆形大门。弧形屋顶。油炸[食物]的味道。”（*Impostores*: 169）

周辰所勾勒的中国场景，更像一幅大型中国版画，而非动态的真实场景。在当代阿根廷小说家塞萨尔·艾拉眼里，“异国情调”就是“将异国特性定义为地方色彩、恋物癖以及商品”<sup>⑥</sup>。周辰带着恋物癖的视角，对各种静态物品做出简单罗列，却没有用任何动词将主人公和它们连接起来。也就是说，观看者并没有做出任何干预。这种观看方式与欧洲的旅行家们并无不同，因而周辰的人物设定暗示了在“将东方作为奇观”与曾经的“将拉美作为奇观”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

① See Neil Larsen, “The ‘Boom’ Novel and the Cold War in Latin America”,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 (1992), p. 776.

② See Grace Yan, “‘China, Forever’: Tourism Discourse and Self-Orientalism”,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A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2 (2009), p. 298.

③ Alberto Fuguet and Sergio Gómez, “Introduction”, p. 10.

④ See Thomas Nulley-Valdés, “Re-thinking McOndo and Its Canonization”, in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 (2020), p. 233.

⑤ See Silvana Paternostro, “Hell Can Be Beautiful: Review of Santiago Gamboa’s *Return to the Dark Valle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19 July 2018,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8/07/19/hell-can-be-beautiful/>[2025-12-20]

⑥ César Aira, “Exotismo”, in *Boletín del Centro de Estudios de Teoría y Crítica Literaria*, 3 (1993), p. 21.

关系”<sup>①</sup>，这无疑是传统东方主义的延续。

反之，其他两位主人公的观看对象却显得有些“另类”。尽管“据欧洲中心主义范式声称，现代性现象只存在于欧洲”<sup>②</sup>，但不管是记者还是汉学家，都被中国随处可见的现代化所震惊：萨尔塞多初到香港时，发现机场“十分现代化”，九龙的“摩天大楼令我目瞪口呆”，“破败不堪的建筑早已被现代的玻璃建筑所取代”，下榻的“中国世界酒店让我惊叹不已……在舒适和奢华方面，亚洲人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想想看，‘亚洲奢华’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简直完美”（see *Impostores*: 85, 88, 154, 124–125）。同样，吉斯伯特也看到了北京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并存，这里既有“古老城墙的遗迹”，也有“高耸的摩天大楼”。当他置身于王府井的人潮中时，“他惊呆了，这里确实是城市中最现代、最热闹的道路，两侧是巨大的弧形屋顶的购物中心”。德国驻华大使对他说：“您可能不知道中国今天正在打开的市场有多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成为过去，这个国家在十年内将成为经济强国。”（see *Impostores*: 131, 132, 236）吉斯伯特对这番话表示认可，也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给予了肯定。正如巴西学者伊德尔巴·阿维拉所观察到的，拉美文学曾经的那种“前现代的宇宙观”，已经被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叙事机制所驯服了”。<sup>③</sup>

这种现代性叙事主导的观看方式，正是哥伦比亚马孔多一代的革新。自1960年代起，一些拉美旅行作家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探寻东方性”仍旧是旅行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其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国的“玻璃球”。他们聚焦当时的政治环境，乐于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权力、暴力与革命交加的混乱国度。<sup>④</sup>而甘博亚所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大多出生于1960年以后，被称为“麦孔多一代”。这个名字得名于1996年阿尔贝托·福格特和塞尔吉奥·戈麦斯编纂的短篇小说集《麦孔多》。<sup>⑤</sup>这部文集集中的二十余位作者均是反对魔幻现实主义技法的拉美作家，

① Héctor Hoyos, “Orientalismo, globalización e imaginarios transpacíficos en la novela latinoamericana actual”, pp. 91–92.

②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One World Periphery Reads the Other: Knowing the “Oriental”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Iberian Peninsula*, p. 10.

③ See Idelbar Avelar, *The Untimely Present: Postdictatorial Latin American Fiction and the Task of Mour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

④ See Megan Ferry, “China as Utopia: 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2000), p. 239; Álvaro Fernández Bravo, “Apropiaciones de la cultura china en la literatura sudamericana contemporánea: Contribución para un mapa tentativo a partir de obras de César Aira, Bernardo Carvalho y Siu Kam Wen”, in *Revista de teoría de la literatura y literatura comparada*, 3 (2015), p. 67.

⑤ See Alberto Fuguet and Sergio Gómez, eds., *McOndo*, Barcelona: Grijalbo Mondadori, 1996.

甘博亚也是其中之一。“麦孔多”这一称谓，是麦当劳与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的结合与变体，意在“讽刺马尔克斯所虚构的那个世界”<sup>①</sup>。拉美需要通过这个虚构的世界才能获得世界的认可，然而放眼西方，“西班牙的大多数文本里既没有斗牛，也没有塞维利亚舞曲，更没有内战”，为什么拉美文学里就一定要有飞毯和丛林？于是，这代作家“与‘爆炸文学’保持着一种弑父的关系”，反抗那必须双手献上玻璃球的命运。<sup>②</sup>在上一代的叙事中，玻璃球是被建构的部分；而在这一代，玻璃球则成了消解的对象。在他们的作品里，找不到一只飞舞的黄蝴蝶——“即便他们这样描绘了，也带有深思熟虑的修辞目的”，例如，甘博亚有意让周辰列出许多中国元素，但此举并非为了营造东方氛围、吸引西方目光，而是为了阐释：“如果仅是通过阅读特殊性来定义一种文化的终极本质，你是无法真正了解这种文化的。”<sup>③</sup>由此，这些刻板印象恰恰具有了近乎解构的功能，甘博亚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滑稽模仿，嘲笑了以往那种寻找“东方特性”的书写模式。

为了争取更大的文学自主空间，麦孔多一代采取了“错位的美学策略”<sup>④</sup>。首要的策略即是用世界文学范式取代本土文学。2003年6月，包括甘博亚在内的13位拉美新生代作家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参加了“拉丁美洲首届作家会议”。关于会议所达成的共识，阿根廷学者豪尔赫·洛卡内总结道：“沿着几年前由‘断裂运动’（Crack）和‘麦孔多’开创的思路，参会者一致认同将‘远离魔幻现实主义’确立为拉美官方的美学范式。”<sup>⑤</sup>这一范式的产生，一方面是作家层面的原因，例如《冒牌者》将背景设定在中国，就体现了甘博亚对地域性书写的拒绝：“我是哥伦比亚人，但我并不觉得我的作品有义务扎根于哥伦比亚。”<sup>⑥</sup>和甘博亚一样的拉美新一代作家开始“渴望以‘全球公民’身份参与更广泛的文化流动网

---

① Mónica Montes Betancourt, “Mario Mendoza y Santiago Gamboa en el panorama de la generación McOndo: obsesiones e inconsistencias”, p. 333.

② See Mónica Montes Betancourt, “Mario Mendoza y Santiago Gamboa en el panorama de la generación McOndo: obsesiones e inconsistencias”, p. 335.

③ See Rosario Hubert, “Rewriting Travel Literature: A Cosmopolitan Critique of Exotic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Fiction”, p. 8, p. 13.

④ Rosario Hubert, “Rewriting Travel Literature: A Cosmopolitan Critique of Exotic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Fiction”, p. 2.

⑤ Jorge Locane, *De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a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mundial: condiciones materiales, procesos y actores*,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9, p. 82.

⑥ Qtd. in Rosario Hubert, “Rewriting Travel Literature: A Cosmopolitan Critique of Exotic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Fiction”, p. 2.

络，同时跻身更庞大的世界文学市场扩张过程”<sup>①</sup>。另一方面，作家的个体意识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外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期待视野发生了改变。从资本获利的角度来说，只有“契合全球背景下的主流自由秩序”的“世界主义”作品，才更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更容易获得巨大的销售潜力。因此，自1990年代起，西方出版社的核心关切之一便是期待拉丁美洲作家发出“不依附于特定地域的全球声音”。<sup>②</sup>千禧年到来之际，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出版社蒙达多利出版社资助多位知名或崭露头角的年轻拉美作家分别前往全球主要城市并进行创作。除了甘博亚赴北京外，还有罗贝托·波拉尼奥赴罗马，罗德里戈·雷伊·罗萨赴马德拉斯，埃克托尔·阿瓦德赴开罗等，他们相继出版了《冒牌者》《荒野侦探》《北京饭店》《非洲海岸》等作品；2008年，巴西字母出版社继续资助拉美作家赴全球多地采风。两次大型的资助与出版举措造就了千禧年以来拉美文学中“游牧式世界文学”（“Orientalism”：245）的大批涌现。

在这样的游牧式文学中，城市书写取代了乡村书写。魔幻现实主义擅长乡村书写，似乎“拉美人就是非现代的，他们住在乡下，整天看着蝴蝶飞来飞去”<sup>③</sup>。甘博亚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来自乡下的作家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前一代的影响下歌颂了农村世界”，然而他从小在波哥大的街头长大，“那条街才是我的小说里应该书写的世界”。<sup>④</sup>1938至1964年，哥伦比亚经历了从农村主导到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深刻转变，甘博亚的成长背景恰好处于全力聚焦城市现代性发展的时代。在《百年孤独》里，小镇马孔多是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作者围绕这一方天地来组织七代人的家族故事；但《冒牌者》的三个主人公在北京的居所和行程都不尽相同，甘博亚围绕不同人物的行程轨迹来组织城市叙事。墨西哥学者加西亚·坎克里尼在探究拉美城市文学时指出，在“巨型城市”中，不存在能串联起线性叙事的核心组织轴，只能通过主体在城市内部的移动路线将不同的情况和场景联系起来。而且，由于这些城市“在无序扩张中仓促生长，令人眩晕”，人

<sup>①</sup> Estefanía Bournot, “Orientalism Expanded? Latin American Travel Narratives Heading East”, in Axel Gasquet and Gorica Majstorovic, eds., *Cultural and Literary Dialogues betwee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24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Orientalism”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up>②</sup> See Jorge Locane, *De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a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mundial: Condiciones materiales, procesos y actores*, p. 85.

<sup>③</sup> Horacio Castellanos Moya, Sara Carini and Clara Foppa Pedretti, “La literatura no funciona en el ámbito del deber ser: Entrevista a Horacio Castellanos Moya”, in *Caracol*, 4 (2012), p. 136.

<sup>④</sup> Qtd. in Mauricio Eleorator, “Escribo para alejarme. Conversando con Santiago Gamboa”, in *Taller de Letras*, 214 (2014), p. 207.

们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感知并呈现这座城市：各种场景层层叠加，场景转换甚至找不到任何因果关联。因而，在当代拉美的城市小说中，“碎片化故事的并置”是最常用的手法之一。<sup>①</sup>三个主人公的移动路线也是如此，他们以各自的酒店为起点，旅行期间少有交集，所处场景之间也没有逻辑关系，只在最后以藏着手稿的阁楼为终点。这三条平行的路线暗含了城市的异质多样性，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三人并无统一答案。这种“无共识”的城市感知，恰恰构成了对城市本质化认知的质疑。当小说拒绝将北京简化为某种单一图景，而是通过三个视角展现其复杂的真实面貌时，便自然呼应了南南东方主义的核心诉求：突破“还原论、本质主义以及种种偏见”<sup>②</sup>，并进一步“意识到建构复合身份的必要性”<sup>③</sup>。

在这样的城市书写中，麦孔多一代将魔幻现实里的奇迹和奇观，转化为更日常的生活场景。他们并不否认拉美国家有丰富而迷人的文化和习俗，但“不能接受还原论的本质主义，也不相信这里每个人都戴着帽子住在树上”。他们更渴望向国际公众讲述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事：“刷牙和郊游，待在公寓或是去购物中心，这些日常活动的描写，相比腾空而起等奇幻情节，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于是，他们眼中的拉丁美洲，是“高速公路、地铁、有线电视和贫民窟”，“是西班牙语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外债”。<sup>④</sup>

事实上，这些元素背后潜藏着拉美的现实问题，如拉美人的生存困境、社会暴力、移民流离失所的苦难、全球南方的贫困和北方霸权的压迫等。同样，在《冒牌者》中，甘博亚也通过日常生活书写融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一方面，小说中既有对“中国速度”的展示，如吉斯伯特注视着北京奢华的摩天大楼，心想“以这样的速度，北京将会变成弗里茨·朗笔下的超级大都市，并成为亚洲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作家也描写了周辰如何整夜难眠地忍受酒店旁边的工地噪音，并将“一天工作 24 小时”视为“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原因（see *Impostores*: 335, 143）。此外，传统要让位于现代化的进程：“北京东南部的传统街区正在被拆除，以便为一条大道让路。”（*Impostores*: 204）这暗示了甘博亚

<sup>①</sup> See Catalina García García-Herreros, “Imágenes de ciudad en la narrativa de Santiago Gamboa”, in Eduardo Rey Tristán and Patricia Calvo González, eds., *XIV Encuentro de Latinoamericanistas Españoles: congreso internacional*, Santiago de Compostela: Universidade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Servizo de Publicacións e Intercambio Científico, 2010, pp. 632–633.

<sup>②</sup>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Alternative Orientalism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07, p. 5.

<sup>③</sup> Maria Montt Strabucchi, *Imagining China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p. 29.

<sup>④</sup> See Alberto Fuguet and Sergio Gómez, “Introduction”, in *Revista de teoría de la literatura y literatura comparada*, 3 (2015), pp. 8–10.

在思考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与平衡难题。这种关切现实的南南思考，将中国视为一个充满活力且面临诸多现实议题的复杂实体，也促使人们反思传统视角下对东方认知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往东方”的旅行作品并非均质统一的整体，作家们的游牧路径实则分化为两条脉络：一条是在完成“逃离魔幻现实主义”必修课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复刻了传统东方主义的殖民姿态。阿根廷学者埃斯特法尼娅·布尔诺意识到，作家们拒绝被“本质化”为“拉丁美洲作家”的同时，“又需要满足文化资本跨国流动的需求”，因此为了在世界文学市场中寻求价值认同，部分作家仍以“西方文化的继承者与代言人”自居，以“西方艺术模式”为标尺，丈量沿途所见的一切文化形态，要么将其判定为“相形见绌的存在”，要么贬斥为“廉价的复制品”，全然无视异质文化的历史脉络与美学逻辑（see “Orientalism”：247-259）。另一条脉络则以甘博亚和墨西哥小说家阿尔韦托·鲁伊·桑切斯<sup>①</sup>等人为代表，他们从“边缘”出发，在遇见东方这另一“边缘”的过程中，突破西方中心的惯性，构建起南南对话认识论，进而形成了千禧年以来南南东方主义这一最新发展阶段。这并非偶然，而是拉美文学在全球南北格局下主动“靠南站”的必然选择，也为未来的南南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框架。

### 三、“他们更像我们”：

#### 《冒牌者》中的南南意识与对现代东方主义的超越

作为“游牧式世界主义”中的一员，甘博亚和他笔下的人物萨尔塞多一样，都是哥伦比亚人，也都在巴黎学习和定居了十多年。在拉美叙事传统中，巴黎往往被塑造成一座让无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光明之城、智慧之城与机遇之城”<sup>②</sup>。然而在《冒牌者》中，这座城市却从未真正地接纳萨尔塞多，而是始终将其视为“外乡人”。同事佩蒂特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慢，质问萨尔塞多“为什么来法国生活”，并抱怨“法国不应该是全世界穷人的收容所”。萨尔塞

<sup>①</sup> 阿尔韦托·鲁伊·桑切斯（Alberto Ruy-Sánchez Lacy, 1951—）前往摩洛哥旅行并写下“摩加多尔三部曲”，重塑了阿拉伯文化。小说的开篇就是“为何一位墨西哥人会执意书写摩洛哥？……摩洛哥给予我的，远不止一些人所认为的‘为故事提供有趣背景’。当然，这也不是爱德华·萨义德所描述的‘北方对南方异域风情的迷恋’——即东方主义。我来自另一个‘南方’，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让我得以提出‘南南关系’的理论——我戏称之为‘水平东方主义’（Horizontal Orientalism）”，在桑切斯看来，拉美和东方之间应该是水平的，而且是流动的（see “Orientalism”：251-252）。

<sup>②</sup> Ana María da Costa Toscano, “Las nuevas diásporas latinoamericanas en *El síndrome de Ulises* de Santiago Gamboa”, in *Cadernos de Estudos Latino-Americanos*, 3 (2007), p. 133.

多解释自己并非穷人，而是“为了学习才来到这里”，佩蒂特却固执地重复“每个人都该住在自己国家”，赤裸裸地将拉美移民视为法国社会的闯入者和破坏者。因此，萨尔塞多对这个巴黎同事厌恶至极：“佩蒂特不仅肮脏，而且粗鲁、傲慢。我简直无法想象，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给别人带来任何快乐。”（see *Impostores*: 84-85, 30）除了佩蒂特之外，上司更是将萨尔塞多视为“一颗棋子”，终日对其发号施令，面对“随时如同陨石般坠落在办公室的种种命令”，萨尔塞多只能“时刻准备冲锋陷阵，奉命交差”（see *Impostores*: 24）。通过对这两个次要人物的刻画，甘博亚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反神话”书写：“巴黎既不是艺术家笔下波希米亚式的城市，也不是作家心中充满浪漫色彩的城市。它是一座遍布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美好事物在书中未被提及，因为事实上，对移民来说，它们并不存在。”<sup>①</sup>

在撞见法国妻子出轨后，萨尔塞多将玻璃杯狠狠地砸向墙壁，壁纸上留下一块刺眼的白色痕迹。他意识到“这种可怕的壁纸装饰着大多数巴黎人的家”，和冰冷而疏离的法国人如出一辙，他也意识到这么一砸，岂不是又印证了巴黎人的偏见——“拉美人就是一群大男子主义的猪”。然而，巴黎人永远不知道这暴力背后隐藏的精神崩塌。萨尔塞多走出家门，在凌晨两点的圣马丁运河边，扶着冰冷的石栏剧烈呕吐，一边咒骂让他失望的伴侣，一边控诉他的故土哥伦比亚。在这样寒冷孤独的夜晚，“那个遥远的国度又一次抛弃了我，让我在思念、痛苦、欢笑、恶心中哭泣”（see *Impostores*: 20）。萨尔塞多陷入了既无法扎根异乡，又难以回归故土的绝境，而他身上挥之不去的焦虑、愤怒与身份撕裂，构成了甘博亚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利西斯症”<sup>②</sup>。

尤利西斯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无数移民的缩影，因此巴塞罗那大学心理学专家何塞巴·阿乔特吉将“移民慢性多重应激障碍”称为“尤利西斯症”。这是现代移民因承受“超出人类适应能力的极端应激”而出现的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其核心是移民在“与家人分离、语言与文化的丧失、社会地位下降、群体归属感缺失”等丧失体验下，产生的包含抑郁、焦虑、躯体化及认知混乱等症状。<sup>③</sup> 2005年，

<sup>①</sup> Ana María da Costa Toscano, “Las nuevas diásporas latinoamericanas en *El síndrome de Ulises* de Santiago Gamboa”, p. 132.

<sup>②</sup> 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在历经苦难的流亡之路中，“日复一日坐在海边的岩石上，在泪水、叹息与哀愁中日渐憔悴，双眼凝视着荒芜的大海，不知疲倦地哭泣”（Joseba Chotegui, “Emigrar en situación extrema: el Síndrome del inmigrante con estrés crónico y múltiple [Síndrome de Ulises]”, in *Norte de Salud Mental*, 5 [2004], p. 139）。

<sup>③</sup> See Joseba Chotegui, “Emigrar en situación extrema: el Síndrome del inmigrante con estrés crónico y múltiple (Síndrome de Ulises)”, p. 140.

甘博亚发表了一部名为《尤利西斯症》的长篇小说，以那些自愿流亡巴黎的现代哥伦比亚移民为关注对象，并植根于自己流亡的真实体验，将东方主义影响下的尤利西斯症书写往前推进了一步。

萨尔塞多的经历构成了尤利西斯症书写的新出发点，面对事业与爱情的挫败，他采取了霍约斯提出的“南南逃离主义的世界政治”路径。这一路径是指“通过描写人们前往非传统目的地（即抛弃拉美旅行者惯常选择的西欧和美国路线）旅行，构建出逃离现实的幻想”<sup>①</sup>。当然，萨尔塞多是被上司派到中国的，然而这趟差旅却直接实现了他逃离现实的目的：甘博亚选择同属权力边缘的中国，通过南南的空间位移，在两个边缘空间的联结中书写对身份认同的新想象，以此来寻找尤利西斯症的解药。

于是，萨尔塞多在中国这片“避难所”上构建了一套新型的东方主义。正如霍约斯所说：“南南逃避主义及其伴随的东方主义，为拉美主体提供了一种‘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世界’的试验场。这一次，第一世界的读者成了‘旁观者’，而‘表演者’则来自其他地方。”<sup>②</sup>在中国上演的故事中，主演不再是巴黎与美国的西方同事，而是与三个主人公短暂合作的中国同事：萨尔塞多的协助者郑，周辰的合作者温晨，加上吉斯伯特的书商朋友程彪，三个中国人折射出了一套治疗尤利西斯症的东方主义观念。其中，郑是推动核心情节发展的关键角色。

初到北京时，萨尔塞多的尤利西斯症表现为强烈的认知割裂：虽然他日渐熟悉城市的街巷，却始终无法理解这个陌生国家的运行逻辑；看到北京街头的喧嚣与烟火，他会瞬间怀念“波哥大的第十三号街”，觉得故土“遥远得像另一个宇宙”（see *Impostores*: 225）。这种对未知的迷茫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让他始终以“外来者”的视角审视中国，甚至在执行任务时也暗藏退意，而与郑的相处，成为治愈他尤利西斯症的关键。郑是一位专业可靠的特工，数次指导萨尔塞多潜入酒店、掩护他突围。郑事先研读了从巴黎传来的报告，报告中，巴黎的上司给萨尔塞多贴上了“胆小、温顺、易受影响、缺乏个性”（*Impostores*: 281）的负面标签。然而在后续相处中，郑却坦诚地对萨尔塞多说：“我已经验证过了，那份评价根本站不住脚——你远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怯懦。”郑的尊重和认可，让萨尔塞多第一次在异乡感受到情感锚定，并直言“郑这个人，真叫我喜欢”，“我们相处得很好”（see *Impostores*: 177）。这份跨越文化的信任，让他逐渐放下对

① Héctor Hoyos, *Beyond Bolaño: The Global Latin American Novel*, p. 66.

② Héctor Hoyos, *Beyond Bolaño: The Global Latin American Novel*, p. 87.

未知的戒备，后期他将隐瞒手稿消息、安排私人告别等事托付于郑，表明他已经与郑形成了紧密的任务伙伴关系，并在与中国人的协作中找到归属感。最后在离开北京的飞机上，萨尔塞多已经被这个城市疗愈了：“我只觉心里的重负卸下来了，但也涌起了浓浓的怀念之情。”（*Impostores*: 332）甘博亚巧妙地将“言说西方人”与“言说中国人”这两种差异化的叙事视角并置，又将“巴黎的致郁”与“北京的治愈”形成对照，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东方主义的偏见对拉美个体生命体验的影响。

不过，尤利西斯症的驱散，并非全靠郑的个体性疗愈，更依赖于一条群体式的疗愈路径。在小说的结尾，义和团的后人已分化为不同分支：北京一脉坚守祖训、秉持正道，加拿大一支却意图借祖先之名大肆揽权；而活跃于加拿大与美国北部的黑手党正觊觎那份手稿，计划高价转卖给加拿大的义和团分支。在北方黑手党的操控下，周辰和吉斯伯特被绑架到一座隐秘的仓库，这里还关押着藏匿手稿的雷吉斯神父；萨尔塞多也在密报的通气下迅速赶来。原本有利益冲突的三位旅行者，摒弃了最初的疑虑和猜忌，在被囚禁的困境中互相扶持。周辰在中间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努力化解误会和冲突，他拦下神经紧张的吉斯伯特，担起了中间人的角色：“他〔萨尔塞多〕是哥伦比亚人，我是秘鲁人。让我试试和他说说。”（*Impostores*: 313）在这一过程中，郑更是以“隐形枢纽”的角色，将三位主人公凝聚成临时共同体。面对黑手党蒙面人的持枪威胁，郑冷静地根据三人特质分配任务：让熟悉建筑结构的周辰指引逃生路线，借吉斯伯特的中文能力确认街道名称，联系接应车辆，再与萨尔塞多配合压制外围火力，最终四个人携手摆脱了全球北方势力的攻击和报复，成功脱险并顺利拿到手稿。故事的结局颇具圆满色彩，手稿的原件归周辰所有，因为他被视为新义和团的领袖，理应保管义和团的文化遗产，而吉斯伯特和萨尔塞多则分别获得了复制品。

不少学者通过甘博亚数部小说的结局分析其笔下的尤利西斯症书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病症的解药归结为一种团结精神。霍约斯指出，“这类南南逃避主义小说构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全球视野，其特征是草根层面的跨国主义与团结精神”<sup>①</sup>。巴西学者安德森·达·马塔亦认为治愈这一精神病症的良方在于一种以互助为核心的共同体意识，即“处于同一边缘的主体之间编织的团结网络”<sup>②</sup>。

① Héctor Hoyos, *Beyond Bolaño: The Global Latin American Novel*, p. 67.

② Anderson Da Mata, “A experiência do exílio na ficção contemporânea: as saídas e entraves em Santiago Gamboa e João Gilberto Noll”, in *Contra Corrente: Revista do Programa de Pós-Graduação Interdisciplinar em Ciências Humanas*, 1 (2017), p. 18.

智利学者玛丽亚·蒙特·斯特拉布基提出，甘博亚“批判了中心和边缘的霸权主义思想，构建了一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共同体思想”<sup>①</sup>。库什吉安也总结道，这种东方主义“呈现出一种另类的解读范式，它致力于与‘他者’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开放性，恰恰凸显了彼此联结的合作本质”<sup>②</sup>。

学者们广泛提及的团结精神，正是南南东方主义与现代东方主义的根本区别。博尔赫斯曾说：“相比新托马斯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遥远的庄子离我们更近。庄子所涉及的问题才是根本性的。”<sup>③</sup>博尔赫斯通过触碰人类精神的共通之处，拉近了东方和拉美之间的距离，这为后人浇筑南南东方主义中的合作意识铺平了道路。然而，博尔赫斯虽然对中国文化等东方元素怀有浓厚的兴趣，但他总体上对共同体持不信任态度，更注重个体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南南东方主义对现代东方主义的超越便体现于此：它构造了跨越国界的南南合作，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共同探寻摆脱压迫的自由之路。

这种团结精神在周辰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从他对中国人的称谓由“他们”变成了“我们”就可见一斑。起初，周辰为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而踏上寻根之旅，此时的他仍带着明显的“外来者”自觉：“他们把我当作外国人，尽管我的祖父是从这个街区出去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Impostores*: 170）直到发现祖父曾是义和团领袖，周辰的心态才彻底转变，主动承担了“寻回手稿、重振社团”的使命，将个人行动与义和团的历史传承绑定。最后他被推选为新义和团名誉领袖，并当众大声疾呼：“凡是希望这梦想能实现的人”“凡是想要为自己、为祖国、为历史赢得荣耀的人”“凡是渴望获得尊严、获得意义、获得充实人生的人，都来加入我们吧。”（see *Impostores*: 340）此时“我们”的称谓已彻底取代了“他们”：他将自身命运嵌入新义和团的集体理想，构建起一个不设地域、种族门槛，仅以“对尊严与荣耀的追求”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这种转变恰恰印证了葡萄牙学者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的观点：南方知识分子的发声本质是“站在那些遭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支配的受压迫者的角度来言说”<sup>④</sup>。甘博亚笔下的边缘群体亦是如此：尽管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拥

① Maria Montt Strabucchi,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1987–2016)*,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82.

② Julia A. Kushigian, “The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and Self-Orientalism in a South-South Dialogue: Revisiting Hispanic Orientalism from Said to Sarduy”, p. 109.

③ Jorge Luis Borges, *Borges en Sur. 1931–1980*, Buenos Aires: Emecé Editores, 1999, p. 235.

④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and the Future”, p. 21.

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视角与生活经验，但当核心诉求回归“生存”与“尊严”时，文化差异便不再是隔阂，他们最终“在生存和追求尊严的人道主义目标中团结在一起”<sup>①</sup>。

这种南南联结的强化，源于“共同敌人”的存在，即上文斯特拉布基所说的“霸权主义思想”。小说里来自拉美各国的主人公们在北京“举杯欢庆”，祝酒词“为了人民的自由，为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为了正义降临到恶人身上，为了南北关系更加公平”（*Impostores*: 194）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的团结并非基于私人情感，而是指向对“共同敌人”的反抗。在现实世界里，“共同敌人”暗指全球化中占据经济、文化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以及其背后延续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逻辑。自1960年代以来，拉美一直承受着新自由主义、依附关系以及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经济迫害，拉美人民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国际分工”带来的经济利益。对此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资本给食物链底端的印第安农民“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更多的坟墓”<sup>②</sup>。由经济领域出发，拉美地区在文化和舆论领域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并开始积极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在小说中，三个主人公的“共同敌人”是以托尼为代表的北美黑手党，后者为了手稿背后的50万美金，通过绑架、袭击等暴力手段建构起一条跨国利益链条，体现了逐利、投机与无国界的资本运作网络对南方的压迫。于是，在面对“共同敌人”的存在时，原本分散的三个主人公凝聚成具有集体行动力的群体。

甘博亚的批判方式充分体现了拉美南南东方主义核心理念：南方知识分子并不直接“逆转和颠倒南-北的权力关系”，而是“通过加强南-南主体之间的团结”来实现对北方的批判。<sup>③</sup>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一套南南团结的认知框架，这套框架不依赖北方的标准来定义南方，因此南方主体不再需要通过北方的“认可”来证明自身价值，不再需要用北方的叙事逻辑来阐释自身经历，故而也就能逃离尤利西斯症痛苦。在小说中，这套南南意识的认知框架主要体现在将中国视为可理解、可借鉴和可合作的对象这三个层面。

首先，南南意识打破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困境，展现出边缘文化主体间相

---

<sup>①</sup> Anderson Da Mata, “A experiência do exílio na ficção contemporânea: as saídas e entraves em Santiago Gamboa e João Gilberto Noll”, p. 19.

<sup>②</sup>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

<sup>③</sup> See Anderson Da Mata, “A experiência do exílio na ficção contemporânea: as saídas e entraves em Santiago Gamboa e João Gilberto Noll”, p. 19.

互理解的可能性，并将中国视为一套可理解的话语。在传统东方主义的叙事脉络中，西方作者们惯于强调“试图理解‘他者’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热衷于聚焦“他者”身上那些始终封闭、难以窥探的特质，刻意放大文化认知间的鸿沟，但强调“理解的不可能性”只会让进入异文化的主体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与无力感”（see “Orientalism”：257）。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甘博亚频繁且细致地在方方面面铺陈“理解的可能性”。在小说中，中国的语言、美学与文学构成了一套虽然异质、但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欣赏的话语。作为汉堡大学的汉学教授，吉斯伯特坚信语言背后隐藏着宇宙秩序和社会世界密码的密码，而汉字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正是解开这一密码的关键。吉斯伯特推测，中文里蕴含着连接不同语言体系的“通用代码”，因此具有“巴别塔混乱中丢失的圣经语言”般的神圣地位（see *Impostores*：3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能带来独特的、其他语言体系中即便替换同义词也无法复刻的情感冲击，这让吉斯伯特深深沉浸在汉语的情感韵味之中。

在南-北认知框架中，东方景观常常被视为一个民族野蛮性的体现；然而在《冒牌者》中，甘博亚细腻地描写了中国美学是如何浸润于北京的风物景致之中的：胡同里的灰墙黛瓦、故宫的飞檐斗拱、颐和园的湖光山色，都极大地满足了主人公们的审美和心理需求。吉斯伯特在天坛的古建筑间流连忘返，在北海的清风中安然睡去，在紫竹院的湖边喝茶沉思，这一切让他意识到“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一座城市来感受被爱时，就会爱上这座城市”，因此他“彻底爱上了它”（see *Impostores*：241）。小说主人公们不再把东方当作猎奇的对象，而是将自己的深情融入这座城市中，使得眼前的景致足以抚慰人心，成为他们探索真实东方的生动注脚。这一过程正是拉美南南东方主义的关键路径之一，即“通过将他人纳入自身来理解他人”<sup>①</sup>。

中国文人也跨越山海，在小说人物心中激起了强烈的精神共鸣。例如，吉斯伯特“曾在夜里面对杜甫的一页诗”，激动地颤抖着问道：“这是什么奇怪的体系，我完全不了解，却让我感到快乐？”他第一次读王勉的《改名记》时，感觉一股愉悦的波浪冲击着大脑的港湾：“王勉似乎是为他而写的，然而，他们的人生是多么的不同：王勉讽刺了体制，而克劳斯[吉斯伯特]却是体制的一部分……总之，他们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却有着相似的灵魂。”（see *Impostores*：

<sup>①</sup>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Alternative Orientalism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p. 5.

39, 41) 中国文人的文字从未刻意“讨好”异邦的读者, 却凭着对人类共通情感的精准捕捉, 成为跨越山海的精神桥梁。吉斯伯特不必通晓中国古代的社会风貌, 即能在中国文人的笔下看见自己灵魂的倒影。这种共鸣与对话, 也出现在周辰那里——他将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座巨大的建筑”, 其间“无数诗人、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现代和古典小说家在那相遇。……鲁本·达里奥与李白热烈交谈, 并承诺将在马那瓜痛饮一番。”(see *Impostores*: 274) 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 催生出对这份文化的崇敬与尊重。正如吉斯伯特告诉德国驻华大使的那样: “我还想让您知道, 我是最尊敬和崇敬中国文化的人之一。”(*Impostores*: 236) 这也印证了库什吉安在 1990 年代提出的开创性观点: 拉美东方主义“对东方有着其他西欧国家无法比拟的崇敬与尊重之情……也包含着对多样性的包容与尊重”<sup>①</sup>。正是这种对东方的“崇敬与尊重”, 帮助拉美与中国作为“欧洲文化的他者们”, “努力在彼此之间建立跨洲际对话……从而创造出丰富的南南跨文化交流与对话”。<sup>②</sup> 南南东方主义证明了边缘之间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共鸣, 构建起平等、自主、丰富的跨文化生态。

在第二个层面上, 南南东方主义突破了认知霸权与话语垄断, 不仅凸显出南南文化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更将中国视为一套可资借鉴的积极话语资源。美国学者柯智思·特蕾莎认为, 拉美作家对东方的书写与建构“并非为了获得权威, 而是为了挑战现有的权威和权力结构”, 由此, 东方书写将拉美文学引向了“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解构任务”。<sup>③</sup> 例如, 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视角中, 西方被塑造成“现代性霸权话语”的代表, 东方则被西方强行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拉美和中国一样, 不断遭受着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冲击。对于这一点, 小说的主人公取道于中国, 探寻某种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立的东方精神资源。例如, 周辰在飞机上与肛肠科医生史密斯相遇, 他告诉周辰: “将中医技术与西医技术相结合, 有望为我们的患者带来极大的缓解。”小说里有一个无辜的档案管理员, 被黑手党用“用黄铜漏斗打开了他的肛门, 灌入滚烫的热水。[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让西医束手无策的烫伤绝症, 居然让中医给治好了, 这让史密斯大为惊讶(see *Impostores*: 58, 32)。中医常常被西方现代科学体系所压制, 然

① Julia Alexis Kushigian, *Orientalism in the Hispan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Dialogue with Borges, Paz, and Sarduy*, p. 3.

② See Ignacio López-Calvo, “Introduction”,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Peripheral Transmodernities: South-to-South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nd “the Orient”*, p. 3.

③ See Chisu Teresa Ko, “Orientalism and De-Ori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Reading César Aira”, p. 151.

而甘博亚不仅将中医视为西医的有效补充，甚至认为其价值已超越西方现代医学。事实上，中医也是近年来拉美文学里反复出现的主题<sup>①</sup>，拉美作家倾向于设置这样的情节：“当主人公迷失于西方文化时，中国成为拉美世界的拯救者和启蒙者。”<sup>②</sup>此外，间谍郑曾经跟萨尔塞多强调过中国人的和平理念：“德国曾发生的暴力掌权，在这里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我作为一名士兵，曾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下接受训练，根据该理论，所有战俘都是潜在的盟友。”（see *Impostores*: 177, 220）与西方暴力主导的历史相比，中国的和平理念显得尤为珍贵。拉美作家通过寻觅东方，既质疑欧洲对现代性的垄断，也反思自身文化中殖民遗产的影响。如库什吉安所说，拉美东方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它不追求对其他文化的支配，而是通过平等对话揭示真相以终结文化统治，也拒绝带着“教导‘他们’变得更像‘我们’”<sup>③</sup>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异文化。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拉美构建另类话语的重要替代式思想资源，实现了华裔美国学者周蕾所言的“把‘他者’转化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和可利用的价值”<sup>④</sup>。

在第三个层面上，南南东方主义突破了中拉之间的文化隔阂，不仅凸显了南南合作的可能性，更促进了一种互相忠诚、互相成就的南南关系的建立。在各种积极的东方力量作用下，吉斯伯特坦言：“北京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汉学家，开始感受到这个如诗如梦般的世界，他惊讶地发现，从他笔尖流淌出的一切“都变成了诗”（see *Impostores*: 241）。周辰也从自己的祖父身上，意识到文学的深刻之处并非在于所谓的“特殊性”，而在于普遍的人性：祖父为人“淳朴、沉默、谦虚，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这让他领悟到了东西方在精神层面上的共通之处，故而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超越东西的对立关系去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作品是对东西方复杂关系的思考。虽然主人公以个体的方式呈现，但他身上蕴含着真正人类本性的精髓。”周辰从一个为了虚名投机取巧的作家，变成了一个能打破界限、洞察人性的作家，于是他对新义和团成员们感激不已：“事实上，是你们帮助我理解了自

① 如在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小说《财富之女》（*Hija de la fortuna*, 1999）中，女主人公伊丽莎在前往美国的淘金途中被一位中国药师所救，并从他身上获得了知识和精神上的力量。中国药师代表的中医文化，戳破了西药无所不能的现代性神话。

② Isaac Rivera-Campos, “The Orientalist Route in Isabel Allende’s *Daughter of Fortune*”, in Ignacio López-Calvo, ed., *Alternative Orientalisms in Latin America and beyond*, pp. 158–159.

③ Julia Alexis Kushigian, *Orientalism in the Hispan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Dialogue with Borges, Paz, and Sarduy*, p. 3.

④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 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己。”(see *Impostores*: 245–246) 特蕾莎将这种肝胆相照、互相成就的南南关系称为“南南忠诚”<sup>①</sup>。南方话语不仅让吉斯伯特“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让拉美变成更好的拉美，彰显了南方话语在建构拉美身份与主体话语方面的思想力量。南方世界唯有完善自身的主体建构，方能实现南南东方主义的终极追求——全球认知正义，即“打破由全球北方所主导的认识论体系……转而关注底层、边缘以及长期被忽视的全球南方认识论，发掘其中蕴含的知识财富”<sup>②</sup>。中国文化、文学以及美学等逐渐赢得了南方伙伴的尊重和景仰，正体现了全球认知正义的调校与发展，进一步为全球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基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甘博亚同时也揭示了南南关系的推进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冒牌者》里，主人公们怀揣着早期现代欧洲冒险家那般横扫世界、闯荡全球的幻想，可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例如，当萨尔塞多试图冲破秩序、拒绝工作时，其法国上司竟威胁他：“别忘了，一个电话打到巴黎，我就能让你丢掉工作，再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失去在法国居留的权利。”(*Impostores*: 259) 诚如智利学者爱德华多·德维斯所言：“南南交流的最大问题在于，大部分阻力来自北方。”<sup>③</sup> 因此，如何化解这股来自北方的强大阻力，并使其为我所用，已然成为促进南南交流的核心难题。

三个人物都拿到手稿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新义和团会再次出现吗？历史会再次重演吗？又或许，一切想象中的重大事件都不会发生？这些问题都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萦绕在主人公心头的那股对手稿的迷恋，终将褪色与消散。当然，这并非因为手稿是一场骗局，而是因为一旦找到它，人们就可以像吉斯伯特一样，拿到专门制作赝品的中国古董商那里，变出无数的复制品。可见，“手稿”是作者试图打破的最后一颗“玻璃球”，在机械复制技术的力量下，它的光韵和神秘性完全被消解了。正如霍约斯所说：“中国从未将自己神秘化，只是旁观者需要用一种清醒、客观的目光去看待它。”<sup>④</sup> 这种清醒的目光，既需要拉美作家在时间维度上挣脱过去本土作家留下的紧箍咒，又需要他们在空间维度上，剥离西方强加的特定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框架，进而探索和描绘出全

① Chisu Teresa Ko, “Orientalism and De-Oriental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Reading César Aira”, p. 151.

② Sara Ross, “Review: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Bon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in *Alberta Law Review*, 4 (2017), p. 1063.

③ Eduardo Devés, “Hacia una teoría de la circulación, con énfasis en la circulación de las ideas”, p. 270.

④ Héctor Hoyos, “Orientalismo, globalización e imaginarios transpacificos en la novela latinoamericana actual”, p. 93.

新的全球南方版图。

在小说中，三位人物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倾注了一腔热血，然而在现实中，南方的文学版图并不容易绘制，“统一的南方想象很难被建构起来，全球南方的文学之间也难以辨认与彼此认同”<sup>①</sup>。甘博亚的《冒牌者》以及中国系列小说已发表二十余年，但至今尚未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恰恰说明了南南交流的匮乏和困难。墨西哥裔美国学者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普拉多认为南南的无效文化沟通源自中拉之间缺乏必要的“文学基础设施”<sup>②</sup>，如出版、翻译、研究、媒体以及评奖机构等。没有文学的物质联系，就不可能构建起真正的文学认知。洛佩斯-卡尔沃也认为，作为“小”文学，这类小说缺乏翻译和发行量，很难像其他西方文学一样，通过文本“经典化”或“商业化”的手段完成文化资本化，因此难以在南南间实现思想大巡游。但是他提出，可以通过为这些“小文学”编纂文选、开办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设置奖项等方式，为南南思想和文化提供循环的契机和场域。<sup>③</sup>在中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南南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一个真正没有中心的、“无核”的思想循环体系，一个“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将不同边缘地区联系起来的南方思想网络”。<sup>④</sup>或许到那时，世界文学的版图将不再全由西方来主导绘制。

[作者简介] 覃琳，女，1986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理论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奇异的哀悼”：莫亚〈错乱〉中的后见证书写》（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1期）等。

责任编辑：舒荪乐

① Ignacio M. Sánchez Prado, “África en la imaginación literaria mexicana. Exotismo, desconexión y los límites materiales de la ‘epistemología del Sur’”, in Gesine Müller, Jorge J. Locane and Benjamin Loy, eds., *Re-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Writing, Book Markets, and Epistemologie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South*, p. 64.

② Ignacio M. Sánchez Prado, “África en la imaginación literaria mexicana. Exotismo, desconexión y los límites materiales de la ‘epistemología del Sur’”, p. 66.

③ See Ignacio López-Calvo, “Worlding and Decolonizing the Literary World-system: Asian-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n Alternative Type of Weltliteratur”, in Gesine Müller, Jorge J. Locane and Benjamin Loy, eds., *Re-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Writing, Book Markets, and Epistemologie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South*, pp. 15–32.

④ See Eduardo Devés, “Hacia una teoría de la circulación, con énfasis en la circulación de las ideas”, p. 269.